

改革开放四十年《极玄集》研究综述

张倩, 刘则权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55)

摘要:《极玄集》是“唐人选唐诗”选本之一。1978年以来,其研究经历了三个分期:1978-1988年是沉默期,鲜有文章论述《极玄集》;1989-1999年间是发现期,《极玄集》多作为探究诗人时所提及的作品;新世纪之后,陆续出现《极玄集》的专述论文,在版本、题材、风格、选诗标准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果。但与其他唐诗选本研究相比,《极玄集》未形成完备的研究体系,关于《极玄集》的佛道美学、生活美学、比较研究等方面略显不足,其价值并未充分挖掘。

关键词:《极玄集》;唐诗选本;研究体系;现状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8)01-0074-07

“昼公评众制,姚合选诸文”,《极玄集》为姚合编选,“其成书约为开成初年”^{[1]51}。《极玄集》成书后,影响深远。韦庄在《又玄集》中明确指出自己深受《极玄集》的影响;赵师秀所编选的《二妙集》《众妙集》中也兼有大量《极玄集》中的诗歌。但就目前笔者所搜集的资料来看,学界对《极玄集》的关注度较低。1978-1988年间,《极玄集》几乎被忽视,仅在研究“大历诗人”中有所提及,且一笔带过。1989-1998年间,《极玄集》研究逐渐升温。傅璇琮主持编撰《唐人选唐诗新编》,华夏出版社整理出版《唐人选唐诗六种》,两者均包括《极玄集》,为《极玄集》研究奠定了基础。21世纪以来,陆续出现专文论述《极玄集》,目前论述《极玄集》的专文约有8篇。同时,在探讨“姚合”、“大历诗人”、“中晚唐诗歌”时,《极玄集》也占较多笔墨。但整体来看,其研究仍旧薄弱。基于此,本文以改革开放为起点,梳理研究《极玄集》的相关论文。

一、版本及刻本

资料整理为研究提供可能。1978年后,《极玄集》主要有五个版本:一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唐人选唐诗十种》,二是由傅璇琮主持编撰的

《唐人选唐诗新编》,三是华夏出版社出版的《唐人选唐诗六种》,四是昆仑出版社出版的《唐人选唐诗》,五是由傅璇琮主持编撰的《唐人选唐诗新编(增订本)》。

1. 1978年“海版”

目前,关于《极玄集》版本,普遍认为有两个系统:“一为宋钞本一卷本,另一为元建阳蒋易所刻二卷本”^{[2]668}。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唐人选唐诗十种》,《极玄集》被收入其中,此版本的《极玄集》共收录诗99首,分上下两卷。卷内有姚合“极玄集自序”和蒋易所题“极玄集序”,基本上保留了《极玄集》的原貌。在首页,出版社声明此版本《极玄集》以元至元刊本为底本,对于这一说法,傅璇琮认为:“元至元刊本为建阳蒋易刊本,但现今已不存,今人所见的或为明代重刻本、或为何焯所抄录的本子。”^{[2]667-668}笔者查阅相关资料后,未见建阳蒋易刊本的一手资料,故笔者赞同傅璇琮的观点。

2. 1996年“傅版”

1996年,傅璇琮主持编制《唐人选唐诗新编》一书,对《极玄集》的成书、版本、流传均作详细考证。其中《极玄集》是以宋钞本为底本,共收录诗100首,未分上下卷。傅璇琮经多方考证,

收稿日期:2017-11-07

作者简介:张倩(1978-),女,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唐诗;刘则权(1993-),女,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唐诗美学。E-mail:1509524950@qq.com

增添了戴叔伦《送谢夷甫宰鄞县》诗一首，恢复了诗歌总数目，是《极玄集》整理方面的又一进展。除此之外，《唐人选唐诗新编》还附有详细的版本考证说明——《极玄集》前序，是一本对研究《极玄集》具有较大参考价值的书。

3. 1998年“蔡版”

华夏出版社在1998年出版《唐人选唐诗六种》。其中，《极玄集》由蔡宛若作注，有诗99首，无戴叔伦的《送谢夷甫宰鄞县》，分上下卷，出版社指出此版本以元刊本为底本。在卷首，有出版社所写的《关于〈极玄集〉》之序，序中含有姚合、韦庄等人对《极玄集》的评价。对《极玄集》有整体介绍，方便读者整体把握，未保留姚合撰写的《极玄集》原序，实属一大遗憾。但值得肯定的是，在每首诗末尾出现注解，这对理解诗句、体味情感有很大帮助。整个《唐人选唐诗六种》浑然整体，若为多个选本中共同选录的诗歌，只作一次注解。

4. 2006年“昆版”

2006年，昆仑出版社出版《唐人选唐诗》，其中包括《篋中集》《河岳英灵集》《国秀集》《御览诗》《中兴间气集》《极玄集》《又玄集》《才调集》《搜玉小集》。标明《极玄集》所采用的是元代至元刊本，共收录诗99首。《极玄集》前面有姚合等人所作的序，此版本对《极玄集》的流传与保存有一定的贡献，丰富了《极玄集》的版本，但其瑕疵之处同“1978年海版”。

5. 2014年“增订版”

2014年，中华书局出版《唐人选唐诗新编（增订本）》，其书共有唐人选唐诗十六种（除“96年新编”的十三种外，还有《元和三舍人集》《宝氏聊珠集》《瑶池新咏集》），该书由傅璇琮、陈尚君等主持编撰，为最新版本。在增订版序中，对较1996年版略有改动之处一一指出，其学术态度令人敬佩。并附有“前记”，以宋刻本为底本，论述了影宋抄本的长短之处，对《极玄集》卷本、流传、刻本做了详细地论述。笔者认为，此版本是研究《极玄集》最好的参考资料。

6. 其他刻本

关于刻本，除上文所提到的宋刻本与元蒋易元刊本之外，邹艳在《论〈极玄集〉选诗标准的

特色及影响》中提到十种明刻本：“北京图书馆所藏的莫堂跋、杨守敬题款的明刻本（莫跋明刻本）；明嘉靖刻《唐人选唐诗六种》本；明杨巍辑《六家诗选》本；明万历张世才刻《唐诗六集》本（清华大学藏）；汲古阁刊本刻《唐人选唐诗八种》本（湖南藏本有佚名清顾广圻批校，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藏本有高世异校跋并录莫友芝题识）；明又玄斋秦四麟抄本；明毛氏汲古阁影宋抄（北图藏）；明万历刻本（南京图书馆藏本有清丁丙跋）；《评点极玄集》本（明徐武子）。”^{[3]123}

傅璇琮在《唐人选唐诗新编》中，提到了“郑振铎藏明刻唐人选唐诗六种本（郑藏明刻本），明又玄斋秦西严抄《唐诗极玄》本，傅增湘过录之何焯校汲古阁《唐人选唐诗》八种本（汲本）”^{[4]530}。由此可见，《极玄集》刻本相当丰富，也显示出《极玄集》受到众多人青睐。

二、内容与题材

内容与题材体现社会风貌与诗人生活状态。目前，对《极玄集》内容与题材的探讨较为完备，大致认同《极玄集》主要表现日常生活，对政治抱负无过多激情，热心对日常生活琐事的关注。

1. “酬赠送别与感性咏怀”

赵蔚荣较早提出这一观点，指出“《极玄集》中酬赠送别之作为55首，感兴咏怀之作44首”^{[5]28}，认为《极玄集》中的诗歌多与生活相关。周衡也持此观点，认为“送别、酬和、寄赠等社会交往诗依旧是《极玄集》最多的一种题材”^{[1]52}。俞林波对《极玄集》中重复率较高的字做了统计，认为《极玄集》有“送别诗31首、寄赠诗11首、题咏诗4首、酬和诗4首，共50首，占全部选诗的50%。另外，选诗题目中虽没出现‘送’、‘别’等字，但表达这一意思者仍然存在，所以，送别诗、寄赠诗、题咏诗、酬和诗的实际数量比我们统计的还要多”^{[6]44}。周非非也认可这一说法，认为“从题材上看，首先，送别、酬和、寄赠等社会交往诗数量最多，约48首……其次，感兴、闲适题材的诗歌也多达43首”^{[7]33}。诸怡冰也认为“送别题赠题材是最多的”^{[8]6}，并将《姚少监诗集》与《极玄集》比较，为后续《极玄集》研究打开新思路。

除以上之外,吴凤玲在《从盛中唐<唐人选唐诗>诗类分析看士人审美心态的变化》中,将《极玄集》中所有诗分为“咏怀、赠答、咏史、乐府、游览、行旅、哀伤、挽歌、题画、题壁、杂诗、咏物”^{[9]15}十二类,其分类之详细是前所未有的。但在分类之时,略有混淆重复之嫌,如“哀伤”本为一种情感基调,并不是一种题材,其分类的准确性有待商榷。

2. 有无“边塞诗”之论

赵荣蔚较早地在《晚唐大历诗风的回归与<极玄集>》中提出:“无一首边塞题材的作品……边塞之作的蓦然消失,也是甘露之变后诗人对现实社会失去热情,对国事漠然视之心态的消极折射。”^{[10]9}此后,林虹、周非非、何卉分别在《从唐人选唐诗看唐人的诗学观》^{[11]12}、《姚合诗歌论稿》^[7]、《<唐人选唐诗十种>诗学观念》^[12]中重复此观点。2009年,王茹对“无边塞诗”一说提出质疑。稍后,张华林不仅指出《极玄集》有边塞诗4首,并指明《送杨中丞和蕃》与《送彭(王)将军》“为现存‘唐人选唐诗中’入选频率最高的唐代边塞诗名篇”,这为《极玄集》中“有边塞诗”提供了重要论点。在对《送杨中丞和蕃》与《送彭(王)将军》等诗歌进行品鉴后,发现其有大量描写边塞之景的诗句,如“河源飞鸟外,雪岭大荒西。春色临边尽,黄云出塞多”等,作者借边塞之景渲染气氛,体现送别友人时的复杂心情。因此,若认为《极玄集》绝无“边塞诗”,实属不妥。

整体来看,《极玄集》无抒壮志难酬、表入世之情的诗作,也无赞扬事物品行与情操、讽刺揭露社会现实的诗作;意象也多为柳、鹤、琴、霜等生活常见的事物,较少出现生僻意象。因此,《极玄集》以日常生活为描写中心,冷谈政治。

三、风格与审美

风格与审美是诗歌独特的标志,其受题材、语言、意象等因素的影响。当下,对于《极玄集》风格与审美研究观点众多,主要梳理如下。

1. 清幽淡远

此观点较早出现于赵立新的《唐人选唐诗研

究》中,指出“这个选本,鲜明的推扬清幽玄远的诗风”。《唐诗学史稿》中,也指出《极玄集》的风格为“清幽淡远”^{[13]101},此后,被多数学者认同,成为《极玄集》重要审美风格之一。

周衡认为“《极玄集》鲜明地突出了一种清幽冷僻的审美风格”^{[1]53}。周非非、诸怡冰、俞林波、何卉皆指出《极玄集》具有“清幽淡远”的风格特色。周非非认为《极玄集》具有“清疏平诡”^{[7]34}之韵味,俞林波指出“《极玄集》主要选清新一派诗歌,间有绮丽派,不选写实派”^{[6]40},诸怡冰也认为其“清幽深细、真婉淡雅”^{[8]40},何卉在《<唐人选唐诗十种>诗学观念》一文中认为“《极玄集》的诗学观念可以概括为凄清、玄远”^{[12]33}。除此之外,陈斐在《试论<众妙集>与<二妙集>编选倾向兼谈与姚合<极玄集>之关系》中也认为其“风格清幽闲雅”,并详细论述了《众妙集》《二妙集》《极玄集》三者之间的关系,逻辑严密,极具文学价值。

2. 精致玄远

《道德经》中有云“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姚合称所入选的诗人为“诗家射雕手也”,再结合所选诗歌看,多为五律,言语精炼,意味玄远。因此,认为《极玄集》具有“精致玄远”之美。

倪进等在《中国诗学史》中将《极玄集》与《中兴间气集》比较,提出《极玄集》具有“精致玄远之美……更突出一种孤寂的情景和细致的刻画”^{[14]333-336}。《中国古典诗歌要籍丛谈》一文中也有相同的看法,认为其“十分精致,玲珑剔透”^{[15]72}。《极玄集》以五言为主,五言较之于七言有幽深、精巧、含蓄的特点,再加之《极玄集》中诗词对景物描写精巧细致,因此认为《极玄集》有“精致玄远”之美是值得信服的。

3. 悲凉凄苦

鉴于作品多送别之作,文章中又多次出现“泪、寒、凄”等字眼,故此,认为“悲凉凄苦”为《极玄集》审美风格。持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赵荣蔚、陈斐、王茹等。

赵荣蔚指出:“描写景物细致入微、刻画入神……具有浓烈的苦闷和伤感情绪”。王茹在《<极玄集>与姚合诗歌批评研究》中,从“悲自身之

凄”、“叹朋友之别”、“怀故乡之恋”三个方面进行论述，认为《极玄集》具有“悲凄”之特色。陈斐在认为《极玄集》具有“清幽淡远”的特色同时，也认为其“情调悲凉、凄苦，企慕隐逸、闲适”。

4. 雄浑开阔

由于《极玄集》成书于晚唐，大历诗人占据多数，再加之有大量的送别酬唱之作，故此，鲜有人认为《极玄集》有“雄浑开阔”之美。但王茹在其硕士论文中论述了《极玄集》这一特点。

首先，王茹认为大历诗人有盛唐情结，他们的诗歌或多或少会掺入盛唐气象，姚合年轻时心境开阔，有雄浑气概。其次，王茹先后列举《送晁监归日本》《观猎》《送彭将军》等诗，并分析了其雄浑诗风。王茹提出这一点，对于《极玄集》研究是有正面意义的，拓宽了《极玄集》的审美风格。但从整体来看，“雄浑开阔”是《极玄集》少数作品的审美风格，不足为其主要风格。

“清幽淡远、精致玄远、悲凉凄苦、雄浑开阔”都为《极玄集》的审美风格，是研究者基于不同研究视角得出的结论。但《极玄集》中也有活泼快意之作，如《少年行》《羽林骑》等，这一审美几乎未有人提及。这两首诗，无论从意象的选用，还是色彩搭配与情感，都体现出轻松、快活的意蕴。由此看来，《极玄集》的审美风格仍旧有较广的研究空间。

四、入选诗歌之标准

姚合编选《极玄集》有明确的编纂意图，诗人以大历年间为主，多为五律，悲凄闲适之感浓厚。唐代诗人众多，姚合为何将这些诗歌选入《极玄集》，经整理，现将主要观点梳理如下：

1. 标王维为宗，喜清幽淡远

“选本通过选这一特殊的行为按一定的原则为作家在选本中排列次序，为作家定位”^{[16]8}。姚合将王维放置卷首，选本中有王维诗二首，其中一首就有“射雕”二字，因此，《极玄集》有标“王维为宗”之意。王维诗境清幽，充满逸致，与姚合“诗风清丽的特点、清幽闲远的意境”^{[17]82-85}相吻合，故此，姚合以“王维为宗、清幽淡远”为

选诗原则。

持上述观点的有王茹、张震英、周衡、许连军等。许连军较早提出此观点，“王维、祖咏二人可以说是盛唐山水诗的代表，其诗模山范水，清幽淡远，且寓禅趣禅理。这正是姚合诗歌创作所追求的，也是姚合编选《极玄集》的旨趣所在。姚合此举显然是以王维、祖咏为标准、作范式，标举清幽淡远的诗风。”^[18]张震英也赞同此看法，认为“王维、祖咏是《极玄集》诗人共同风格的渊源所在”^{[17]91-95}。除此之外，王茹关于此观点的论述更为详细，王茹将姚合、王维以及《极玄集》中其余二十位诗人的诗歌作比较，列举诗歌相通与相似之处，得出：“可以把王维看作统领全集的诗人，因为我们似乎可以从各种角度找到王维对大历诗人的影响，进而影响到姚合等人。”^{[19]13}

2. 弃盛唐之音，扣中晚唐审美

安史之乱后，经济萧条，社会黑暗，士子关注日常生活的热情高于关注社会政治，审美流行由“富丽雄浑”转为“清幽淡远”。《极玄集》风格清幽淡雅，是紧扣中晚唐审美的表现。

邹艳在《〈极玄集〉选诗标准的特色及影响》中，从“独重大历诗人，扣合了中晚唐的历史背景”、“选诗重清幽淡雅悲凉、妙合中晚唐诗风总特点”、“选诗以五律抒聚散之情，切合动乱伤离别的社会现实和诗人喜律的特点”^{[4]119-126}等方面进行论述，认为“《极玄集》的这些选诗标准深受当时文坛风气的影响，又反映了盛唐之后士子文人的创作心态、人生价值”^{[4]119}。文章逻辑严密，是论述《极玄集》选诗原因最详细、最全面之作。

3. 以五言为多，切科举交往

《极玄集》以五言为主，其中五律占很大比重。唐代科举考试以诗赋为主要内容，其中五言诗，特别是五律诗是重要体裁；五言有精炼、幽深、含蓄等特点，文人间交往，以及在正式场合，五言诗备受文人喜爱。姚合在编选《极玄集》时注意了这一点，因此《极玄集》以五言为主。赵荣蔚、俞林波等表达了这一观点。

赵荣蔚指出：“《极玄集》99首作品中，五言占有绝对优势。其中，五言排律1首，五律87首，五绝8首，七绝3首，无一首七律，几乎全

部为五言律诗。这一方面因为当时进士试诗均为五言体,写作五言可以为应试做准备。”^{[5]28}此后俞林波也提出:“五言的这一文雅、持重的特点,五言多被正式的场合选作‘语言形式’。唐朝,政府组织的科举考试规定的应试诗在形式上是‘五言’的,一般是‘五排’。‘五言诗’还被用于比较正式、严肃的交往之中。”^{[6]41-42}

4. 提供范式,庶免后来之非

姚合生平姿态平和,热心助人,在《极玄集》序中,姚合也指出此书为“庶免后来之非”,因此,《极玄集》有提供范式、供后人参考学习之意。明确表达这一观点的有王茹等。

王茹分析了《极玄集》中王维、祖咏等人的炼字情况,认为姚合编选《极玄集》受到了皎然诗歌理论的影响,指出:“在《极玄集》短短的小序中,姚合提到选诗的目的,是‘庶免后来之非’,他大概是要免除后来人的非议,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论,他要通过选诗来树立作诗的典范,为后人的诗歌创作指点迷津,避免后人在创作时走不必要的弯路。”^{[19]17}

选本的编纂,会受社会及个人因素的影响。一方面,社会氛围及审美流行是编者应该考虑的,而选本也具有示范作用,因此,《极玄集》既契合中晚唐审美,也为科举交往、后人写作提供了参考;另一方面,“凡是对艺术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倒并不在于作文心、文册、诗品、诗话,而在出选本”^{[20]329},个人的喜好是影响选本的因素之一。姚合对王维诗歌的赞赏与认同,在其诗集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也是他将王维放在选本之首的缘由。

五、其他研究

除上述之外,在其他论文之中,也有散见的关于《极玄集》的论述,主要表现在对《极玄集》比较研究与为何《极玄集》不入选一些“大家”两个方面。

1. 缺“杜、元白”等诗歌研究

姚宽在《西溪丛语》中指出:“殷璠为《河岳英灵集》不载杜甫诗……姚合作《极玄集》,亦不收杜甫、李白。彼必各有意也。”^{[21]59}《极玄集》共收录诗人二十一位,李白、杜甫、元稹、白居

易等“大家”为何未出现于《极玄集》之中,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两个原因上:其一是“李、杜、陈、元白等人的诗歌与姚合对诗歌审美追求不符”,其二是“李、杜、陈、元白等人的诗歌审美与当时社会审美不符”。

曾枣庄指出“因艺术趣味不同(如《极玄集》《才调集》,多数都未选杜诗”^[22]。张小琴也认为未选“杜诗”入集的原因在于杜甫的大部分诗歌与晚唐社会情形不符,指出:“姚合所处的社会和文坛风气上看,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相争,成为中晚唐社会的三大政治痼疾……因此,诗作中有颇多无奈的叹息和冷落寂寞的情调……姚合为扣合这一历史背景,追求凄婉哀苦的诗韵,其选诗也就以闲淡幽远为标准。”^{[23]23}对姚合未收录“元白”等诗人诗歌的问题,赵荣蔚认为《极玄集》的出现是社会审美由“尚艳到崇雅”的标志,而元白等人的诗具有“迁艳”的特点,故未选“元白”诗歌。孙桂平也认同此观点,并提出《极玄集》的出现是姚合反对“元和诗风的表现”^{[24]93-94}。选本的成书,必然会受到作者自身喜好与社会风气的影响,未入选的诗人未必成就不高,我们应理性而客观地看待。

2. 《极玄集》与其他选本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极玄集》与其他选本的比较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极玄集》与《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又玄集》的比较;其二是《极玄集》与《众妙集》《二妙集》的比较。

曹丽芳在《韦庄研究》一文中将《极玄集》与《又玄集》共同入选的诗人及诗歌做了整理,指出:“韦庄与姚合的审美标准有很大的相似成分。但韦庄针对姚合已经选定的作品又作了不同的取舍。”^{[25]36}除此之外,周衡从体裁、题材等方面对《极玄集》与《中兴间气集》进行了比较,指出:“《中兴间气集》与《极玄集》都是以大历诗歌为选择、品鉴对象,然而,基于接受水平、期待视野特别是审美视野不同,他们对大历诗歌的艺术关照往往存在差异……《极玄集》作为一个深远的选本,其必有独特之处,而非《中兴间气集》的复制品……姚合在《极玄集》中非常鲜明地突出了一种清幽冷僻的审美风格。”^{[1]53}

陈斐在《〈众妙集〉、〈二妙集〉与姚贾诗

派的确认》《试论〈众妙集〉与〈二妙集〉的编选倾向——兼论与姚合〈极玄集〉之所关系》等文章中论述了三者的关系，认为《众妙集》中所选诗人诗作分为“姚、贾之渊源者，受姚、贾濡染者，诗作与姚、贾类者三类”^[26]。诸怡冰等也论述了这一相似的观点，认为：“《众妙集》比起《极玄集》来，其所选诗歌显得更为精致。而造语的平易浅切不务怪奇则是二家选诗的共同特征。因此，就选诗来看，四灵之一的赵师秀，其与姚合的审美追求和趣味确实大体一致。”^{[8]17}卢燕新在《〈极玄集〉、〈诗例〉〈极玄律诗例〉考辨》一文中对《极玄集》《诗例》和《极玄律诗例》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认为“姚合有《极玄集》，为选诗总集；有《诗例》，又称《极玄律诗例》，为选评律诗的总集。”^[27]文章有大量的史料与理论支撑，观点令人信服。

六、关于《极玄集》研究的几点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极玄集》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首先，不同版本的《极玄集》先后问世，丰富了《极玄集》的多样性；其次，在“题材”内容方面，研究趋于成熟，取得了重大进展；再次，在审美方面，虽然有一些较细微的审美风格被忽视（如《少年行》所表现出的活泼快意之美），但总体上对《极玄集》的审美风格把握正确；最后，在选诗标准方面，虽未得出精确的答案，但学者们提出的观点有理有据，能纳入选录标准的考虑范围。但与其他“唐人选唐诗”选本相比，《极玄集》研究的步伐稍稍落后，仍有较广的研究空间。基于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1. 注重以精读文本为基础，加强相关作品的研究

如《姚合诗集》《中兴间气集》等。一方面，姚合美学思想不仅体现在选本中，在其诗集中也有所体现，将姚合诗集与《极玄集》进行比较研究，不仅能显现姚合独特的审美个性，也能为《极玄集》研究提供材料支撑。另一方面，《中兴间气集》与《极玄集》是现存“唐人选唐诗”选本中成书时间最为接近的，将两者进行比较研究，

不仅能显现出各自的特色，也能看出中晚唐诗歌审美风格整体倾向。

2. 注重以史料为依据，多视角审视《极玄集》

多视角审视《极玄集》，应注意《极玄集》与“佛道文化”、“生活美学”、“地域关系”的探讨。首先，《极玄集》中“尚闲适”之诗较多，并且收录灵一、皎然等僧人的诗歌。赵立新在《唐人选唐诗研究》中对《极玄集》与“佛道文化”有所涉及，但未详细论述，因此，与此相关的研究有必要进一步深入。其次，《极玄集》中所选取的意象大都来源于日常生活，描写细致入微，将日常生活提升到艺术审美层次，可从生活美学视角审视《极玄集》。最后，石树芳、傅璇琮等人分别在《唐人选唐诗研究》《唐人选唐诗与〈河岳英灵集〉》中论述了选本与地域的关系，但未涉及《极玄集》与地域关系的论述。笔者认为，《极玄集》所入选的诗人大多为河南、江苏等地，这与姚合任官游历是否有关联？因此，《极玄集》与地域文化之间的关联有待考证。

3. 注重加强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借鉴吸收新的理论观点与研究方法

首先，关于唐诗研究，日本学者提出了众多观点，可借鉴吸收，为《极玄集》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其次，关于研究方法，欧美学者常常独树一帜，可将其内化、运用于《极玄集》研究中。值得补充的是，1989年，简贵雀的博士论文为《姚合诗及其〈极玄集〉研究》，但在笔者搜集有关《极玄集》的论文时，未搜集到其原文，实属一大遗憾。可见，学术交流是文学发展的重要动力，《极玄集》研究也应遵循这一规律。

参 考 文 献

- [1] 周衡. 论姚合《极玄集》[J]. 江苏科技大学学报, 2004(3): 50-55.
- [2] 傅璇琮. 唐人选唐诗新编: 增订本[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 [3] 邹艳. 论《极玄集》选诗标准的特色及影响[J]. 南昌大学学报, 2004(4): 119-123.
- [4] 傅璇琮. 唐人选唐诗新编[M]. 西安: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6.
- [5] 赵荣蔚. 从尚艳到崇雅——论《御览诗》、《极玄集》在中晚唐诗风衍变历程中的座标意义[J]. 漳州师范学院

- 院学报, 2002(4):24-28.
- [6] 俞林波. 大历年浙东联唱考论[D]. 漳州:漳州师范学院, 2009.
- [7] 周非非. 姚合诗歌论稿[D]. 长春:吉林大学, 2007.
- [8] 诸怡冰. 永嘉四灵诗与姚合的流变关系[D].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2009.
- [9] 吴凤玲. 从盛中唐《唐人选唐诗》诗类分析看士人审美心态的变化[D]. 哈尔滨:东北师范大学, 2007.
- [10] 赵荣蔚. 晚唐大历诗风的回归与《极玄集》[J]. 盐城师范学院学报, 2000(4):6-9.
- [11] 林虹. 从唐人选唐诗看唐人选诗观[D].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 2006:12.
- [12] 何卉. 《唐人选唐诗十种》诗学观念[D]. 石家庄:河北大学, 2013.
- [13] 陈伯海. 唐诗学史稿[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4.
- [14] 倪进. 中国诗学史[M].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02.
- [15] 王学泰. 中国古典诗歌要籍丛谈[M].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4.
- [16] 邹云湖. 中国选本批评[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2.
- [17] 张震英. 姚贾诗论[D]. 石家庄:河北大学, 2003.
- [18] 许连军. 唐中期唐诗选本与唐诗观念的流变[J]. 常德师范学院学报, 2003(3):74-77.
- [19] 王茹. 《极玄集》与姚合的诗歌批评研究[D].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 2009.
- [20] 鲁迅. 鲁迅全集:第四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 [21] 姚宽. 西溪丛语·卷上[M]. 上海:中华书局, 1993.
- [22] 曾枣庄. 杜甫与唐代诗坛[J].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2002(4):17-22.
- [23] 张小琴. 《唐人选唐诗》(10种)选、阙杜诗[D]. 厦门:厦门大学, 2007.
- [24] 孙桂平. 唐人选唐诗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 [25] 曹丽芳. 韦庄研究[D].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 2003.
- [26] 陈斐. 《众妙集》、《二妙集》与姚贾诗派的确认[J]. 郑州大学学报, 2010(1):108-110.
- [27] 卢燕新. 《极玄集》、《诗例》与《极玄律诗例》考辨[J]. 文学遗产, 1996(3):151-153.

A Review of the Studies in Four-decade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on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Most Mysterious*

ZHANG Qian, LIU Ze-qua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an Univ. of Arch. & Tech., Xi'an 710055, China)

Abstract: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Most Mysterious* is one of the selected works of Tang poetry anthropology by people of Tang Dynasty. Its study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since 1978. In the quiet period from 1978 to 1988, there are few articles expounding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Most Mysterious*. In 1989-1999, which is known as the discovery period,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Most Mysterious* is taken as the reference when poets of Tang Dynasty are studied. In the new century, more and more theses on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Most Mysterious* appear with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 in the version, the theme, the style, the standard to select poems and other aspects. Compared with the study of other poetry anthropologies of Tang Dynasty, a complete research system of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Most Mysterious* has not been formed owing to the inadequate exploration in the Buddhism and Taoism aesthetics, the life aesthetics, the comparative study and other values of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Most Mysterious*.

Key words: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Most Mysterious*; study; status quo

【编辑 吴晓利】